心理科学进展 2023, Vol. 31, No. 5, 721–735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https://doi.org/10.3724/SP.J.1042.2023.00721

·研究前沿(Regular Articles)·

"一个序曲"与"两个阶段"：智慧心理学近 50 年研究历程的写照*

张凯丽 郑 红 汪凤炎

(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南京 210097)

摘 要 为了更好地继往开来，首次将智慧心理学近 50 年的研究历史分为"一个序曲"和"两个阶段"。其中，Clayton 用实证法研究智慧心理的序曲，开始时间至迟不晚于 1976 年，戛然而止于 1982 年，其特点是"昙花一现"。智慧心理学研究的第一阶段，时间始自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延续至 21 世纪初，其特点是"柏林智慧模式一花独秀，新皮亚杰主义智慧观和智慧的平衡理论作为两片绿叶相衬托"。智慧心理学研究的第二阶段，时间始自 2004 年，延续至现在，其特点是"百花齐放"，它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智慧被视为比知识更重要的东西，出现了更多不同的智慧理论和测量智慧工具；二是兴起了多个研究热点，进一步拓宽了智慧心理学的研究领域。回顾智慧心理学近 50 年的研究历程，可以得到两个结论：一是，近 50 年来，对智慧心理学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从分散到有组织、从零星探讨到系统研究的发展过程；二是，研究对象从智慧者的特征到智慧特征，再到智慧者的特征，再到结合智慧者的特征和智慧特征来研究智慧，经历了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展望未来，宜在两个方面推进智慧心理学的研究：一是，须尽快开发研究智慧的成熟实验范式，并揭示智慧的脑机制；二是，须积极开展智慧的应用研究。

关键词 内隐三维智慧观，柏林智慧模式，新皮亚杰主义智慧观，智慧的平衡理论，外显三维智慧模型
分类号 B848

1 引言

《管子·形势》说："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里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由此可知历史研究的重要性。虽然"智慧"是一个常用词，并且，东西方都有厚实的智慧心理学思想史(汪凤炎，郑红，2009, 2010, 2022; Xiong & Wang, 2022)，不过，由于种种原因的影响，它在 20 世纪 70 年代才真正进入现代心理学的视野(Clayton, 1975a, 1975b, 1975c, 1976)。如何对 1970 年以来近 50 年智慧心理学研究历史进行阶段划分，目前仅见 Sternberg 和 Glück (2022)将它分为 3 个阶段：第一阶段，开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直至 20 世纪末，其特征是在 Paul B. Baltes 的领导下，建构出将智慧视作是关于生命的知识的柏林智慧模式。第二阶段，开始于 2001 年 Monika Ardelt 撰文对柏林智慧模式展开尖锐批判，动摇了柏林智慧模式的主导地位，引发更多柏林之外的学者开始研究智慧，出现了更多不同的智慧定义，进而拓宽了智慧心理学的领域。第三个阶段，即当前阶段，其特征是研究者将智慧较少地视为一种稳定的个人特质，而更多地视为一种特定情境的状态，或至少是特定领域的状态(Sternberg & Glück, 2022)。Sternberg 和 Glück 将现代科学意义的智慧心理学研究历史分为 3 个阶段，其优点是理清了柏林智慧模式在智慧心理学领域的演化史，并让人看清了智慧心理学在 21 世纪以来的演化史。其值得商榷或拓展

收稿日期：2022-12-11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1971014); 2020 年度江苏省第五期"333 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科研资助项目；国家留学基金(2021 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
通信作者：汪凤炎, E-mail: fywangjx8069@163.com

的地方主要有五：(1)只字未提 Vivian Clayton 在智慧心理学研究初期所做的贡献；(2)将第二阶段的开始时间定于 2001 年是否准确？(3)将“当前阶段”视作智慧心理学研究的第三阶段能否成立？因为 Sternberg 和 Glück 未明确第三阶段开始的时间或标志，他俩所说的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之间在研究范式或基本理念上没有显著差异，后者只是前者的自然延续而已，且两个阶段加起来的时间还不到 20 年，时间太短，故不能视作是两个独立阶段；(4)未论及柏林智慧模式为什么未借鉴 Clayton 的智慧心理学思想的原因；(5)对新皮亚杰学派等其他几种智慧观或着墨太少，或根本未论及。为了更好地继往开来，借鉴 Sternberg 和 Glück 的上述观点，再结合笔者团队的研究，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智慧心理学研究历史分为“一个序曲”与“两个阶段”，“一个序曲”与“两个阶段”之间的关系犹如长江后浪推前浪一般，即前浪未完全消失前，后浪已在酝酿中，甚至已初步成形。在此基础上，对智慧心理学近 50 年研究历程进行了总结，并作了展望，以期推动智慧心理学更好地向前发展。

2 昙花一现：智慧心理学研究的序曲

在现代智慧心理学界，一般公认 Vivian Clayton 是第一位用实证法研究智慧的心理学者(Hall, 2010)。Clayton 用实证法研究智慧心理的序曲，开始时间至迟不晚于 1976 年，戛然而止于 1982 年，其特点是“昙花一现”，即 Clayton 开启了自己学术生涯中专门研究智慧心理的一个短暂时期。为什么是 Clayton 首次用实证方法研究智慧？为什么 Clayton 突然放弃智慧心理学的研究？她后来对当年做出放弃智慧心理学研究的决定后悔吗？为什么 Clayton 的研究只能称作智慧心理学的序曲，却不能视作智慧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阶段？为什么后起的柏林智慧模式没有继承 Clayton 研究智慧心理学的思路？要解开这些谜团，就须弄清她的家庭成长史、她的本科和博士求学阶段以及参加工作后的际遇。

Clayton 于 1950 年出生在美国纽约，早在童年时期就痴迷于她的父母、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之间性格与行为的显著差异，带着这份好奇，于 1968 年到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心理学专业读本科(Hall, 2010)，期间撰写了一篇题为《当Erikson 的人格发展理论应用于老人：作为矛盾认知的智慧》的论文作为一门专业课程的期末作业，以试图弄清其父亲身上那难以捉摸的品质(elusive quality; Druckerman, 2018)。Clayton 为什么要研究 E. H. Erikson 的“人格发展八阶段理论”里的智慧心理学思想？因为在 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的心理学界，智慧心理学思想只约略出现于 G. Stanley Hall 的《衰老，生命的最后一半》一书(Hall, 1922)和 E. H. Erikson 的“人格发展八阶段理论”中，前者是 Hall 基于自己的观察和内省(Sternberg & Glück, 2022)，其学术性自然比不上 Erikson 的“人格发展八阶段理论”。Erikson 在 1950 年出版的《儿童期与社会》一书里阐述了“人格发展八阶段理论”。在该理论中，Erikson 从个体心理与社会发展层面来探讨智慧，认为智慧是自我的力量或美德(Wisdom is the ego strength or virtue)，包括根植于知识积淀的成熟才智和成熟判断力。智慧摆脱了时间相对性，允许个体在直面死亡时对生命本身表现出一种超然的关怀，所以，在通常情况下，一个人的智慧只有在其生命发展周期的第八个阶段才会出现，它是个体成功解决因死亡威胁所产生的心理危机之后的产物，换言之，智慧是个体毕生心理与社会发展的顶点(Erikson, 1959, 1964)。遗憾的是，Erikson 在提出这一主张后，并没有过多地研究这个主题(Hall, 2010)。Clayton 先分析了 Erikson 的人格发展八阶段理论，并将其与其它有关发展的有机体理论(other organismic theories of development)综合起来考虑，得出结论：大多数人在青春期后，要么寻求止赎(foreclosure)，要么进入长久的停滞，从未达到人格发展的第八阶段，因此，在面临人格发展每一阶段所遇到的难题时，对冲突力量的妥协(compromise)而不是完全解决冲突，似乎是通向第八阶段最常见和最现实的方法，尽管这是不够的(Clayton, 1975a)。Clayton 的这篇论文首次较深刻地剖析了 Erikson 人格发展八阶段理论里的智慧心理学思想，并对 Erikson 关于个体只有成功度过 8 个人生阶段所面对的危机后才能发展出智慧的观点表示质疑。该文于 1975 年发表在《人类发展》期刊上(Clayton, 1975a)，重新燃起人们研究 Erikson 人格发展八阶段理论里的智慧心理学思想的热情，并让她获得了一个到美国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读心理学博士的机会，可以继续研究智慧(Hall, 2010)。

1972 年, Clayton 到南加州大学, 跟随积极老龄化领域的领导者之一、社会心理学家 J. E. Birren (1918~2016)攻读博士学位, 继续研究智慧。为了进行实证研究, Clayton 在查阅和分析关于智慧的文献后认为, 智慧是指一种思维方式或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 将其定义为具有潜在的情感、认知(风格)或问题解决成分的构念, 并假设, 智慧者的智力高于平均水平, 比不智慧的人更灵活, 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强; 智慧者行为背后的情感过程将集中在情绪稳定性、内部控制点以及容忍模棱两可的能力上(Clayton, 1975b)。Clayton 比较了 3 个年龄群体——法学学生(青年人)、律师(中年人)和法学教授(老年人)——中被同伴提名为相对智慧与相对不智慧的被试在其选择并整合的一组智慧测量指标上的得分差异, 使用聚类分析与方差分析对数据进行处理, 但研究结果不理想(Clayton, 1975b, 1976)。这意味着她针对智慧这个主题做的第一个实证研究失败了, 仅从历史文献中得出的智慧定义缺乏有效性, 对智慧的操作化还存在一些困难(Clayton, 1976)。因此, Clayton (1975c)又进行了第二项关于智慧的实证研究, 这次她不再事先确定智慧的定义, 而是试图通过研究结果得到智慧的定义：首先, 让被试列举描述智慧的词汇, 共得到 150 个; 其次, 选出 150 个描述词中频次最高的 33 个, 请另一组被试对这 33 个描述词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描述智慧者进行 7 点评分; 然后, 进行因子分析, 但结果仍不理想(Clayton, 1975c, 1976)。

上述两项有关智慧的实证研究结果虽都不理想, 却表明智慧的结构是多维的(Clayton, 1976)。于是, 在 Birren 的建议下, Clayton 开始将智慧视为一种多维心理结构, 试图将它定义得更加科学(“操作性定义”), 以便继续进行实证研究(Hall, 2010)。有了前两次实证探索的失败经验, 为了避免重蹈覆辙, 并为未来开发智慧测量工具提供基础, Clayton 首次采用由其师兄 Forrest W. Young[1] 改良的多维标度法(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MDS, 一种多元测量模型)研究青年人、中年人和老人等 3 个群体的内隐智慧观, 试图回答以下 4 个问题：(1)在受过教育的人群中, 智慧是否被视为一个多维构念？(2)定义智慧的维度是什么？(3)这些维度在人群中是否一致？(4)如果发现观点上的差异, 它们是否与年龄、性别或能力水平等内在变量有关？(Clayton, 1976)。虽然因子分析和多维标度法的目标相似, 但多维标度法适用于事先不知道构念的基本维度并且没有公认的相应物理维度可用的情况(Guilford, 1954)。从前期两次实证研究中, Clayton 得到“同情的” (empathetic)、“实用的” (pragmatic)、“敏锐的” (observant)、“直觉的” (intuitive)、“聪明的” (intelligent)、“平和的” (peaceful)、“好内省的” (introspective)、“温和的” (gentle)和“幽默感” (sense of humor)等 9 个描述智慧的形容词, 加上“博学的” (knowledgeable)、“有经验的” (experienced)和“善解人意的” (understanding)等 3 个常用于描述智慧者的形容词, 共得到 12 个智慧描述词构成词表。为了比较智慧与年龄以及自我的关系, 又在词表中加入“年长的” (aged)和“我” (myself), 最后加上“智慧的” (wise)一词, 构成最终用于测量的包含 15 个形容词的词表。Clayton 采用多维标度法, 将 15 个形容词两两匹配, 共形成 105 个两两匹配的形容词对[$1/2 \times n \times (n-1)$], 如“聪明的−敏锐的”和“聪明的−我”, 等等, 要求被试评定每个形容词对内的两个形容词的相似性程度, 采取李克特式 5 点量表评分, 从“非常相似” (very similar, 记 1 分)到“非常不同” (very different, 记 5 分)。为了获得可靠性估计, 随机选择 22 组形容词对重复出现, 每组形容词对中形容词的顺序也随机呈现, 被试共需进行 127 次形容词对的相似性判断(Clayton, 1976)。Clayton 于 1976 年 9 月完成了题为《智慧概念的多维标度分析》的博士学位论文, 并顺利通过答辩, 获得博士学位。在该文中, Clayton 发现, 年青人、中年人和老人等 3 个群体的内隐智慧观大同小异, 都是一个包含认知(cognitive)、情感(affective)和反思(reflective)三种品质(qualities)的三维结构构念(Clayton, 1976)。因此, Clayton 首次给智慧下了一个经验性定义：智慧是一个多维结构, 具有明确的情感、反思和认知成分(Clayton, 1976)。因为前期进行的两项实证研究结果都不理想, 也未公开

[1] Clayton 的博士论文委员会(Dissertation Committee)由 J. E. Birren、Norman Cliff 和 K. Warner Schaie 组成, 其中, J. E. Birren 任主席 (Clayton, 1976), K. Warner Schaie 也是社会心理学家, Norman Cliff 教授是心理测量学领域的一个重要人物, 他是 Forrest W. Young (1940~2006)的博士论文委员会主席, Young 于 1967 年获得博士学位。多维标度法是 Torgerson 于 1952 年最早提出, Forrest W. Young 对多维标度法作了重要改进。

发表, Clayton 称其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是史上首个对智慧的实证研究(Clayton, 1976)。由此可知, 作为开创性地用实证法研究智慧的第一人, Clayton 用实证法研究智慧的时间至迟不晚于 1976 年 9 月, 因为此时她已完成了其博士学位论文。

Clayton 在博士毕业后到旧金山州立大学心理学系当助理教授, 开始在心理学会议上报告她的智慧心理研究成果, 引起了包括当时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任职的毕生心理学家 Paul B. Baltes 在内的一些研究者的密切关注(Hall, 2010)。因在智慧心理学上的开创性研究, Clayton 于 1979 年转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心理咨询系当助理教授(Hall, 2010)。1980 年, Clayton 和 Birren 合作撰写并在一部论文集里发表了题为《智慧纵贯个体一生的发展: 一个古老话题的再审视》的论文, 在该文里, 他们汲取东方传统智慧观的精义, 将智慧定义为把握变化万千又时有矛盾的人性的能力, 并通过多维标度统计程序分析, 认为智慧与认知(经验和智力)、情感(共情)和反思(直觉和内省)特征相联系。1982 年, Clayton 发表了《智慧与智力: 个体晚年时知识的性质与功能》, 指出智慧与智力在定义上有差异: 智力可以定义为一种让个体能够进行逻辑思维、概念化和从现实中进行抽象思考的能力; 智慧可以被定义为把握变化万千又时有矛盾的人性的能力。虽然智力和智慧都被认为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的, 并且都为个体终身获得知识提供了条件, 不过, 智慧的本质及其在发展过程中的功能与智力有足够的不同, 值得单独审视(Clayton, 1982)。

遗憾的是, Clayton 在 31 岁时从哥伦比亚大学辞职, 不再研究智慧。因为她认识到自己正在研究一个内容繁杂且抽象的概念: “我当时迷失在智慧的银河中, 每颗星星都同样灿烂; 我意识到我天生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学者, 我走到了岔路口, 如果我想在我的生活中有所作为, 我最好离开那里, 重新接受训练, 然后工作, 这就是为什么我最终没有继续研究智慧的原因” (Hall, 2010)。自此之后, Clayton 离开了学术界和纽约, 以老年神经心理学家的身份参与临床工作, 至退休时止再也没有专门从事智慧心理学研究。因此, Clayton 有关智慧心理学的实证研究, 始自其攻读博士学位期间, 终止于其从哥伦比亚大学辞职, 她发表的最后一篇有关智慧的学术论文是 1982 年(Clayton, 1982)。

Clayton 专门研究智慧心理时的身份只是博士生和助理教授, 且专门从事智慧心理学研究的时间不长, 其智慧心理学研究成果虽在当时的美国心理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激起 Baltes 和 Sternberg 等知名心理学家研究智慧的兴趣, 但并未真正在心理学界吹响研究智慧心理学的号角。虽然 Baltes 和 Sternberg 都是在看到 Clayton 研究智慧后才开始智慧心理学的研究, 不过, 柏林智慧模式、智慧的平衡理论与 Clayton 的智慧心理学思想之间没有明显的继承关系, 因此, 它不能算作智慧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阶段, 故 Sternberg 在其著作中论述智慧心理学的 3 个阶段时, 只字未提 Clayton 在智慧心理学研究初期所做的贡献(Sternberg & Glück, 2022)。

虽然 Clayton 对智慧心理学的研究不能视作智慧心理学研究的开创阶段, 却可视作智慧心理学研究的序曲, 这个序曲像昙花一样美丽而短暂。在这个序曲中, Clayton 对智慧心理学研究的贡献至少有三: (1)首次采用实证法尤其是多维标度法研究智慧的内涵, 认为智慧中包含认知、情感和反思三个成分; (2)首次给智慧下了一个经验性定义, 使“智慧”首次从一个较抽象的哲学概念变成一个可以被客观测量的心理学概念; (3)将智慧与积极老龄化过程联系起来。这些创见虽没有对随后诞生的柏林智慧模式产生影响, 但“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进入 21 世纪以来, Clayton 的上述成果对许多智慧心理学者研究者产生了重要影响, 它主要体现在 3 个方面: (1)后来一些智慧定义都强调 Clayton 和 Birren (1980)提出的智慧中包含认知、情感和反思三个成分, 尽管各有侧重(Aldwin, 2009), 尤其是 Ardelt 的外显三维智慧模型(three-dimensional wisdom model, 3D-WM, Ardelt, 2004a, 2004b), 就是以 Clayton 的内隐三维智慧观为基础提出来的; (2)至今多维标度法仍是研究智慧内涵的一种重要方法; (3) Clayton 的研究表明, 可将智慧视作是可以学习的东西(Clayton & Birren, 1980), 这是对智慧认识的一个突破; 同时, 认为老人不一定永远智慧, 年轻人也不一定缺乏智慧(Clayton, 1982)。这些观点激发越来越多的人继续深入探讨智慧与年龄、智慧与积极老龄化的关系和智慧教育等主题。

3 一花独秀, 两片绿叶相衬托: 智慧心理学研究的第一阶段

智慧心理学研究的第一阶段, 时间始自 20 世

纪 80 年代早期, 延续至 21 世纪初, 其特点是"一花独秀, 两片绿叶相衬托"。

3.1 柏林智慧模式一花独秀

毕生心理学倡导者、德国著名发展心理学家 Baltes 于 1980 年就任位于德国柏林、创立于 1963 年的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发展与教育研究所(the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Human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in Berlin)的第三代高级研究员(senior fellow)和联合所长(Co-Director, 排名第一), 带领同事集中探讨在不断变化的社会中有关人类发展、教育和工作有关的基础问题(其中包括智慧)。自 Clayton 退出智慧心理学的研究领域后, Baltes 将智慧心理学研究这个接力棒接了过来, 带领研究所的同仁开始研究智慧, 正式吹响了研究智慧心理学的号角, 从此, 智慧心理学的研究中心从美国转移到德国柏林, 智慧的定义一度带有浓厚的德国文化色彩(Hall, 2010), 智慧心理学领域的一些杰出学者——如 Monika Ardelt 教授、Judith Glück 教授、Susan Bluck 教授、Michel Ferrari 教授和 Igor Grossmann 教授等——多是德裔或有在德国的教育背景(Sternberg & Glück, 2022)。

Baltes 和他的同事通过整合毕生理论(life-span psychology)、专家系统(expert system)和认知老化的积极方面(positive aspects of cognitive aging)三个方向的成果, 于 1990 年发表了《走向智慧心理学及其本体论》(Baltes & Smith, 1990)和《与智慧相关的知识: 在生涯规划问题上的年龄差异》(Smith & Baltes, 1990)两篇论文, 虽未正式启用"柏林智慧模式" (the Berlin model of wisdom, BMW, or Berlin wisdom paradigm, BWP)一词, 二文都明确将智慧视作是关于生命的专家知识系统, 且都较系统地阐述了之后被称为柏林智慧模式的核心观点。因此, 1990 年 Baltes 的团队对智慧的研究虽尚属起步阶段, 但柏林智慧模式的雏形已呈现在世人的面前。从这个意义上说, 柏林智慧模式最早是在 1990 年由 Baltes 的团队首次建构出来的。并且, 基于柏林智慧模式, Baltes 的团队率先开展智慧测量, 最终开发出智慧的表现测量法——柏林智慧模式测量范式(Baltes & Smith, 1990; Smith & Baltes, 1990), 至今仍是测量智慧的一种主流范式。

1992 年, Baltes 和他的同事正式将他们研究智慧的范式命名为"柏林智慧模式" (the Berlin model of wisdom, BMW), 并绘制出模型图展示其核心观点。在柏林智慧模型图中, 他们将智慧定义为对生活中重要但不确定的事情的直觉、良好判断和建议, 由有关生命的重要且实用的专家知识系统构成, 主要包括 5 个子方面的知识: (1)有关生命的重要且实用的事实性知识; (2)有关生命的重要且实用的策略性知识; (3)有关生活情境和社会变化的知识; (4)有关考虑生活不确定性的知识; (5)有关考虑价值和生活目标相对性的知识, 其中前两项是所有专门知识类型都具有的特点, 后三者是智慧独有的(Baltes et al., 1992)。这表明, 在 Baltes 等人看来, 智慧者除了拥有过人的有关生命的重要且实用的事实性与程序性知识之外, 在面对世事时, 智慧者也会自然地考虑到生活的不确定性与人生发展的情境化思维(life-span contextualism), 进而以相对性的价值观来作决定或下判断(Baltes & Staudinger, 2000)。

此后, Baltes 和他的同事也用"Berlin wisdom paradigm (BWP)"指称"柏林智慧模式" (Baltes & Smith, 2008; Baltes & Staudinger, 2000), 不过, 他们对"柏林智慧模式"的核心观点仅有小的润色, 直至现在未发生大的改变。在 2008 年发表的一篇论文里, 他们所画柏林智慧模式的模型图几乎没变。2008 年距离 Baltes 去世已过去了近 2 年时间, 这篇论文可说是 Baltes 人生最后一篇有关智慧的论文(Baltes & Smith, 2008)。

直到 21 世纪初, 在智慧心理学领域, 柏林智慧模式一直处于主导地位, 柏林智慧模式的智慧理念和研究方法一直是智慧心理学领域的主要理念和方法(Sternberg & Glück, 2022), Baltes 也成为早期智慧心理学领域的领军人物, 不过, 按柏林智慧模式去研究智慧, 易导致研究工作繁重且成本高昂, 结果, 当时柏林以外的地方很少有人研究智慧(Sternberg & Glück, 2022)。但是, 在 Baltes 的卓越领导下, 柏林智慧团队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使"智慧"这一主题开始受到心理学界的瞩目(e.g., Baltes & Smith, 2008; Baltes & Staudinger, 1993, 2000; Pasupathi et al., 2001; Smith & Baltes, 1990)。与此同时, Baltes 还培养出了一个智慧心理学的优秀研究团队, 在当代智慧心理学领域成果颇丰的 U. M. Staudinger、A. Maercker 和 J. Smith 等都曾是该团队的重要成员。为了表彰 Baltes 在智慧心理学领域的开创性贡献, Sternberg 与 Glück

在合编的《剑桥智慧手册》扉页上写道：“谨以此书献给已故的 Paul B. Baltes 教授，在智慧心理学早期的开创性研究中，他的贡献远大于任何人。” (Sternberg & Glück, 2019)

3.2 两片绿叶相衬托：新皮亚杰学派和 Sternberg 的智慧观

在智慧心理学研究的第一阶段，新皮亚杰学派和 Sternberg 的智慧观是衬托柏林智慧模式的两片“绿叶”。

皮亚杰认为个体智慧(intelligence，现一般译作智力，也可译作智慧)的发展需要以其思维方式的发展为前提和基础，重视从个体认知发展尤其是个体思维发展的角度探讨个体的智慧及发展，他将智慧视为个体认知发展的最后阶段，以辩证思维的出现为特征(Piaget, 2001; Riegel, 1973)。在此基础上，新皮亚杰学派(Neo-Piagetian，宽泛意义上的，包括深受皮亚杰主义影响的心理学家)认为，青少年在掌握形式运算后，认知发展并没有完成，因为这一认知水平尚不足以处理人们经历的各种复杂问题(Kitchener & Brenner, 1990; Labouvie-Vief, 1990)。他们通过研究发现，智慧实际上是一种超越了皮亚杰认知发展阶段中第四个阶段(形式运算阶段)，而位于其上的第五个阶段——即后形式运算阶段(post-formal operation)——的产物(Labouvie-Vief, 1980, 1990)。新皮亚杰学派对智慧研究的默默推进，为智慧心理学的研究增添了新视角：从思维方式研究智慧的视角。时至今日，思维方式仍然是智慧心理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即使有的研究者并不认为智慧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承认思维方式是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或是其中一个重要维度(e.g., Glück & Weststrate, 2022; Zhang et al., 2022)。

与此同时，Sternberg (1985, 1986)用实证方法测量个体的内隐智力观、内隐创造力观与内隐智慧观，发现智力、智慧与创造力三者在概念上有着明显不同，强化了智慧研究的意义。1990 年，Sternberg (1990a)编辑出版了《智慧：本质、起源与发展》，这是智慧心理学研究史上的第一本论文集。在这本论文集中，Sternberg 将柏林智慧模式与新皮亚杰学派等重要的智慧心理学思想都囊括其中，并首次提出了一个智慧的外显理论，认为智慧中包含知识、过程、一种思维方式、人格、动机和背景环境等 6 个前因要素(Sternberg, 1990b)。1998 年，基于对实践智力(practical intelligence)——人们在现实生活环境中获得并用于解决现实生活问题的智力——的研究，Sternberg 将其前期建构的智慧的外显理论和有关实践智力的研究合并，强调与智慧目标相关的智慧过程，建构出一个新的智慧理论，即“智慧的平衡理论” (A balance theory of wisdom)：智慧是个体以价值观为指导，运用默会知识，通过平衡个体自身、人际间和个体外部的利益，适应、塑造现存环境或选择新环境，以实现公共福祉的过程。自 1998 年以来，虽然 Sternberg 曾多次对该理论里的一些表述进行细微修订，但其核心观点一直保持不变(Sternberg, 1998, 2004, 2019; Sternberg & Glück, 2022)，现已成为智慧心理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理论。并且，在 Sternberg 的努力下，智慧心理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得以集结成书(e.g., Sternberg, 1990a; Sternberg & Glück, 2019, 2022; Sternberg & Jordan, 2005; Sternberg et al., 2019)，方便后来的年轻学者加入研究智慧的阵营。同时，Sternberg 培养了智慧心理学领域的学术共同体，促进了智慧心理学研究者之间的交流，扩大了智慧心理学的影响。自然而然地，Sternberg 成为当代智慧心理学领域的一个重要领军人物，尤其是当智慧心理学领域的早期领军人物 Baltes 于 2006 年去世后更是如此。

4 百花齐放：智慧心理学研究的第二阶段

柏林智慧模式的观点一亮相，就受到新皮亚杰学派 Labouvie-Vief (1990)的批评，Labouvie-Vief 认为，不能将智慧简化为一种有关专业知识的认知理论。Ardelt 认可 Labouvie-Vief 的上述观点，并引用 Claudio Naranjo 的话说，智慧是一种超越聪明才智的知识(Naranjo, 1972)，既不是专门的，也不是特殊的，而是广泛的和普遍的(Ardelt, 1994)。以 Clayton 的研究成果为基础，Ardelt 尝试将智慧作为潜变量进行测量，并探索智慧与年龄以及幸福感等变量之间的关系(Ardelt, 1994, 1997)。不过，她们二人的批评并未击中要害，如“智慧既不是专门的，也不是特殊的，而是广泛的和普遍的”这个观点将智慧视作类似流体智力的东西，并不成立，因为人类的智慧都是有领域性的，而不是泛情境性的(Sternberg & Glück, 2019; Zhang et al., 2022)，故上述质疑在当时没有对柏林智慧模式的地位产生太大影响。

直到 2004 年, Ardelt 专门批判柏林智慧模式的论文发表，才打破了其持续十几年的“一花独秀”地位。Sternberg 和 Glück (2022)声称智慧心理学研究的第二阶段始自 2001 年 Ardelt 对柏林智慧模式的尖锐批判, 因 Sternberg 曾于 2001 年评审那篇论文。但经笔者征询 Ardelt 的看法并经她确认，其批判柏林智慧模式的论文虽在 2001 年投稿，实于 2004 年发表，所以，智慧心理学研究的第二阶段应是始自 2004 年。受到东方哲学中智慧文化的影响，Ardelt (1997, 2000)将智慧定义为基于东方智慧传统的内隐智慧理论和外显智慧理论的认知、反思和情感人格特征的组合。在 Ardelt 看来，智慧并非像只受到西方哲学中的智慧文化影响的柏林智慧模式所说的那样，是关于虚构的人的抽象的、冷冰冰的知识(Baltes & Kunzmann, 2004)，而是由个人洞见组成，这些洞见必须通过个人经验获得，无法从书本上习得。人们在反思人生经历、试图理解所发生的事情并从中吸取教训时，才会获得智慧(Ardelt, 2004a)。进而，Ardelt 基于 Clayton 的内隐三维智慧观编制出三维智慧量表(Three-Dimensional Wisdom Scale, 3D-WS, 2003)，提出外显三维智慧模型(Ardelt, 2004a, 2004b, 2010; Ardelt & Bruya, 2021)，强调东方智慧传统，如重视自我反思、共情等(Wang et al., 2022)，这是一种不同于柏林智慧模式的智慧观。三维智慧模型侧重于人格而非知识，主张智慧是由认知、反思、共情(compassion)三种人格特征维度结合的结果(Ardelt, 2011)。Ardelt 对柏林智慧模式的批判于 2004 年以靶子论文的形式发表在《人类发展》上，该期杂志同时刊发了 3 篇对该文的评价性论文和 1 篇 Ardelt 的回应性论文(Achenbaum, 2004; Ardelt, 2004b; Baltes & Kunzmann, 2004; Sternberg, 2004)。Baltes 和 Kunzmann (2004)对该文的回应是：智慧者虽接近智慧，但不能将智慧者等同于智慧，二者不是一回事, Ardelt 关注的是智慧者的特征(在这一点, Ardelt 与 Clayton 完全一致)，柏林智慧模式关注的是智慧本身的特征。在 Baltes 和他的同事看来，柏林智慧模式里的智慧概念不仅仅是知识，而是一个多维(multidimensional)概念，其内包括作为前因、相关和后果的特定认知、情感、动机和社会因素成分以及生活背景的丰富谱系。因此, Baltes 及其团队并不认同 Ardelt 的上述批评(Baltes & Kunzmann, 2004)。尽管如此，但 Ardelt 的批判引发 Baltes 和 Sternberg 等知名心理学家的回应，在智慧心理学界产生了较大反响，Ardelt 也“一战成名” (Sternberg & Glück, 2022)。在此之后，智慧受到心理学与社会学的更多关注，有更多学者加入到研究智慧的队伍之中，东西方文化中都涌现出大量的智慧研究。

综上，Ardelt 在现代智慧心理学史上至少有两大贡献：一是“破”，通过 2004 年发表的一篇批判性论文，对当时处于一花独秀地位的柏林智慧模式进行了深刻批判(Ardelt, 2004a)，彻底动摇了其一花独秀的地位，为其后智慧心理学研究迎来“百花齐放”的局面打下了扎实的思想基础。二是“立”，兼顾西方文化与东方智慧传统，以 Clayton 的内隐三维智慧观为基础，从人格角度研究智慧，在 2004 发表的质疑柏林智慧模式的论文中，Ardelt 首次建构出外显的三维智慧模型(Ardelt, 2004a; Ardelt & Bruya, 2021)，在 2004 年对 Baltes 的回应论文的再回应一文里首次使用 the three-dimensional wisdom model (3D-WM)一词(Ardelt, 2004b)，只不过，Clayton 的三维智慧观是她以普通人为被试做研究得出的内隐智慧观，Ardelt 的三维智慧模型是其作为智慧心理学领域的专家建构出的外显智慧观。同时，鉴于并非所有的情感都有利于个体和群体智慧的生成，也为了避免与情绪以及其他情感相混淆，Ardelt 将其情感维度限定在共情上(Ardelt, 2011)。以三维智慧模型为理论基础，结合普通人的内隐智慧观, Ardelt 先后编制出 2 个版本的三维智慧量表，一个是于 1997 年开始收集数据，于 2003 年首次发表的共 39 个题项的版本(Ardelt, 2003)，另一个是 2017 年发表的共 12 个题项的简化版本(Thomas et al., 2017)。Ardelt 为智慧心理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测量工具，较之柏林智慧模式测量智慧的繁琐，该测量工具简便易行，更便于推广使用，促进了智慧的测量研究，并得到多种文化背景下研究者的修订与使用(e.g., Bang & Montgomery, 2013; Bang & Zhou, 2014; Kim & Knight, 2015)，也激发了研究者编制不同智慧量表的兴趣(e.g., 傅绪荣, 汪凤炎, 2020; Grossmann, 2017; Levenson et al., 2005; Webster, 2003)，开启了智慧心理学研究的第二阶段——始自 2004 年，延续至当下，其特点是“百花齐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智慧的认识更加全面与深刻，智慧被

视为比知识更重要的东西，涌现出很多不同的智慧理论与测量智慧的工具，降低了智慧研究的工作量和成本，大大提升了智慧研究的效率，使得智慧心理学领域蓬勃发展。概要地说，由于智慧内涵本身的复杂性、智慧又具有一定的文化普适性和文化相对性，以及研究者个人的知识背景、研究视角与兴趣不尽相同(汪凤炎，郑红，2022)，除了上文已论述的柏林智慧模式、斯腾伯格的“智慧的平衡理论”、Ardelt 的三维智慧模型和新皮亚杰学派的智慧观外，自 2003 年以来，多种智慧理论或观点纷至沓来，每种智慧定义侧重于智慧的不同方面，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幅关于智慧的更全面的图景(Zhang et al., 2022)。其中，如下三种智慧理论都产生了一定影响(Sternberg & Glück, 2022)：(1)智慧的自我超越理论(self-transcendence wisdom)。Michael R. Levenson 等人从东方文化下佛教和哲学对智慧的思考时强调自我超越中汲取灵感，建构出“智慧的自我超越理论”：将智慧等同于自我超越。自我超越指一个人从外在自我定义中解放出来的发展过程，此时个体不再依赖外在特征(如物质、社会角色、成就、名誉、人际关系等)显示自我存在，而关注自我的内心世界(interiority)和精神性(spirituality)，强烈感受到过去和未来的贯通感(connectedness)，自我超越也指消解自我和他人的界限而达到整体合一的状态，获得同情心、深刻的认知能力和自我整合(Levenson et al., 2005)。自我超越能够让个体超越自我中心的局限性，更多关注他人、社会与人类群体的利益，自然有助于个体生成智慧，或智慧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不过，自我超越到底是智慧的重要成分甚至是智慧本身，还是与智慧属于不同的心理建构，只是智慧的重要心理基础或影响因素，能够促进个体的智慧表现，现仍有争论，有待进一步探讨(许文涛，汪凤炎，2022)。(2)智慧的英雄模型(the H.E.R.O. (E.) model of wisdom)。Jeffrey Dean Webster 认为智慧者具备 5 个特征：幽默(Humor)、情绪调节(Emotion Regulation)、回顾与反省(Reminiscence/Reflectiveness)、开放性(Openness)、重要的人生经验(Experience)，智慧是由处于不断发展中的这 5 个成分结合而成的综合心理素质(Webster, 2003, 2010)；由这 5 个特征的英文首字母能合成“英雄(H.E.R.O. (E.))”一词，因此，自 2017 年以来，Webster 等人将 2003 年提出的上述模型称为“智慧的英雄模型” (Webster et al., 2018)。将智慧视作幽默、情绪调节、回忆与反思、经验开放性和生活经验五种关键成分的整合，这对认识智慧的本质有一定启迪，并与 Jason 等(2001)的一项研究结果有共通之处，Jason 等人的这项研究结果表明，智慧的成分里包括“智力：具有天赋、问题解决能力、聪明的”和“热情：有幽默感、善良、同情、活泼”。同时，据《史记·滑稽列传》等的记载，幽默风趣的人如果心怀善念，并将幽默运用到智谏上，往往能取得良好效果，让人觉得他有智慧。不过，“幽默”是否是智慧的关键特征或关键成分？换言之，没有幽默感的人是否就没有智慧？这值得推敲。(3)智慧的德才一体理论。汪凤炎从中国传统智慧哲学中的“必仁且智”思想里汲取灵感，建构出“智慧的德才一体理论”，其核心内容有四：①对智慧的新界定。主张在行为−心理素质−个体三个层面界定智慧：从行为层面看，智慧是智慧行为的简称，智慧行为是指创造性地解决一个难题，并且其行为结果是利他的，而此利他结果被证明是有善良动机的；从心理素质的角度看，智慧是指个体在其智力与知识的基础上，经由经验与练习习得的一种德才一体的综合心理素质。良好品德与聪明才智的合金是智慧的本质；从个体或群体角度看，智慧是指具备智慧素质的个体或群体。②对智慧结构的新看法。主张智慧的二维结构观，认为智慧由德与才两部分组成，将德才一体素质视作智慧的充要条件。所以，智慧中必须包含足够的善。并且，从动机、手段与效果角度看，智慧中的善主要有动机上的善、效果上的善与手段上的善等三种；从品德角度讲，智慧中的善主要包括敬畏、节制、责任、诚信、仁爱、平等公平公正。智慧中的聪明才智主要由正常乃至高水平的智力、足够用的实用知识和良好思维方式三部分构成。③对智慧的新分类。依据智慧包含才能的性质不同，将智慧分为人慧与物慧；依据智慧包含的创造是真创造还是类创造的差异，将智慧分为真智慧与类智慧；依据智慧是情境性的还是泛情境性的差异，将智慧分为特定领域的智慧、普遍性领域的智慧与全知全能的智慧。④对影响智慧生成与发展因素的新看法。主张用五因素交互作用论和智慧的素质与情境交互作用模型来解释影响智慧生成与发展的诸因素(陈浩彬，汪凤炎，2013；Wang & Zheng, 2012；汪

风炎, 郑红, 2014, 2015, 2022; Zhang et al., 2022)。智慧中有良好品德和聪明才智两种成分, 这在智慧心理学界现已是共识(Zhang et al., 2022), 与此同时, 智慧的德才一体理论现已得到一些实证研究的支持(陈浩彬, 汪凤炎, 2016, 2020; 傅绪荣, 汪凤炎, 2020), 不过, 智慧的德才一体理论的一些核心观点——如物慧——目前尚未有实证研究, 故仍须寻求更多的实证证据的支持。由于现已有多种智慧理论, 相应地, 多种测量智慧的量表应运而生, 让研究者有了更多选择, 这些智慧量表主要包括两种测量取向: (1)表现测量取向, 主要是对柏林智慧模式测量范式(Baltes & Staudinger, 1993, 2000; Staudinger et al., 1994)的继承与发展, 脱胎于智力测验和知识测验, 通过被试在解决难题时的智慧表现来测量其智慧水平。其中, Mickler 和 Staudinger (2008)为了测量个体解决自身遭遇的事件时展现的智慧, 即个人智慧(personal wisdom), 改进了柏林智慧测量范式的测量指标与材料, 以从个体自身的角度唤起真实的情绪体验, 又称为布莱梅智慧范式(the Bremen wisdom paradigm)。Grossmann (2017)认为智慧的内涵并非知识所能涵盖, 因此宣称其测量的是智慧思维(wise thinking)或智慧推理(wise reasoning), 将柏林智慧测量范式的测量指标与程序进行简化, 并在实验材料中增加背景信息以提高生态效度, 同时强调在一段时间内测量 2 到 5 次以保证信度, 改进后的测量范式又叫情境综合测量法, 它体现在《情境智慧推理量表》中(Brienza et al., 2018)。Grossmann 也测量个人智慧, 但与 Mickler 和 Staudinger (2008)不同的是, Grossmann 和 Kross (2014)采用统一的测量指标评价个体的第一人称智慧(个人智慧)和第三人称智慧(一般智慧)。(2)自陈测量取向, 多与 Clayton 和 Ardelt 视智慧为一种多维结构的研究思想相一致, 脱胎于人格测验, 将智慧作为潜变量, 通过李克特式量表测量个体的智慧人格特征。以量表首次发表时间为序, 主要包括《三维智慧量表》2003 年版(Ardelt, 2003)和 2017 年版(Thomas et al., 2017)、《自我评估智慧量表》(Self-Assessed Wisdom Scale, SWAS; Webster, 2003, 2007)、《成人自我超越问卷》(Adult Self-Transcendence Inventory, ASTI; Levenson et al., 2005)、《智慧发展量表》(Wisdom Development Scale, WDS; Brown & Greene, 2006)、《简明智慧筛查量表》(Brief Wisdom Screening Scale, BWSS; Glück et al., 2013)、《圣地亚哥智慧量表》(the San Diego Wisdom Scale, SD-WISE; Thomas et al., 2019)与《整合智慧量表》(傅绪荣, 汪凤炎, 2020)等。

二是目前智慧心理学兴起了多个研究热点, 拓宽了智慧研究的领域: (1)智慧定义的纷争与整合。从智慧进入科学心理学以来, 各种定义纷至沓来, 却无一被公认。概括地说, 目前的智慧定义主要有 4 个类别, 分别将智慧视作人自身的一种功能或属性、个体在情境中展现出来的一种属性、人与情境互动中的一种属性或行动的属性(Sternberg, 2019)。面对智慧定义的纷争现状, 当前主要有 4 种整合模型, 依首次发表的时间先后为序, 依次是: ①“智慧的通用模型” (Common wisdom model)。它兼顾西方智慧重认知与东方智慧重道德的传统, 认为智慧主要关注的是在社会认知过程中以道德为基础的优异表现, 并主张智慧的核心是视角的元认知, 而这些都是基于道德愿景和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与经验。智慧让人们看清各类假象, 避免自欺欺人(自我欺骗), 促进以生存为导向的合作和长期规划。“智慧的通用模型”以靶子论文形式发表在 2020 年 6 月出版的《心理调查》(*Psychological Inquiry*)上(Grossmann et al., 2020), 得到 9 个智慧研究团队的回应与讨论, 提高了智慧在心理学领域的热度。②“6P 整合框架” (A unified 6P framework)。Sternberg 等人主张从“6P”的角度——智慧的目的(purpose)、智慧的情境(press)、需要智慧的问题(problems)、个体的认知等心理因素(persons)、智慧背后的心理过程(processes)和智慧的产物(products)——理解智慧, 并指出一个完整的智慧模型需要明确其“6P”的所有内容(Sternberg & Karami, 2021)。③“智慧的素质与情境交互作用模型”。它同样兼顾西方智慧重认知与东方智慧重道德的传统, 强调从素质与情境交互作用的视角理解智慧与智慧行为(汪凤炎, 郑红, 2022)。④智慧行为的“大象模型” (the “Elephant Model” of wise behavior; Glück & Weststrate, 2022)。它也兼顾西方智慧重认知、知识和分析思维以及东方智慧重道德、重直觉和辩证思维的传统(Wang et al., 2022), 认为在应对现实生活的挑战中, 智慧的非认知成分(探索性取向、对他人的关心和情绪调节)会缓和智慧的认知成分(知识、元认知能力和自我反思)对智慧行为的影响。这 4 种整合模型都是最近 2 年内提出的, 谁优谁劣尚有待后续实

证检验，但给智慧研究带来了活力，吸引人们进一步去思考和研究智慧的整合问题。(2)智慧推理。与西方心理学重认知的传统相一致，智慧中特有的思维方式一直是西方智慧心理学的研究重点。Grossmann 等人认为智慧不仅仅由知识构成，因此于 2010 年首次提出智慧推理的概念，认为柏林智慧模式测量的实际上是智慧中特定类型的实用推理(Grossmann et al., 2010)。智慧推理具有亲社会性，伴随人生知识经验的增长而提高，有助于个体有效应对生活事件，如人际冲突(Grossmann, 2017)。紧接着，Grossmann 及其团队展开了一系列的理论与实证研究(e. g., Grossmann & Kross, 2014; Grossmann et al., 2013, 2019; Kross & Grossmann, 2012)，开发出《情境智慧推理量表》(Situated Wise Reasoning Scale, SWIS; Grossmann, 2017)与状态综合测量法(Brienza et al., 2018)，使智慧推理成为当前智慧心理学领域的热门主题之一。(3)智慧与自我。2008 年，Charlotte Mickler 与 Ursula M. Staudinger 建议区分智慧的两种子类型：个人智慧(personal wisdom，简称“PW”)指一个人在自己生活里展现出来的智慧。因此，个人智慧的焦点集中在“一个人在处理自己生活里的不确定性事件和难题时展现出来的智慧”上。一般智慧(general wisdom，简称“GW”)指一个人以观察者的身份或视角，在处理一些一般生活问题时展现出来的智慧。这两种智慧类型是相关的，但在年龄趋势和相关性方面具有特定的差异，因此需要采用不同的方法予以测量(Mickler & Staudinger, 2008)。于是，基于柏林智慧测量范式开发的布莱梅智慧范式被用于测量个人智慧，并使用人格成熟度的概念对其进行调整(Mickler & Staudinger, 2008)。Grossmann 与 Kross (2014)的研究发现，个体在面临自我问题时不如在解决他人问题时更智慧，就像所罗门王(King Solomon)一样，在处理百姓的事情上很有智慧，自己的私生活却一团糟，于是将这种现象命名为“所罗门悖论” (Solomon’s paradox)，同时提出，通过将第一人称视角转换为第三人称视角的方法可以摆脱自我中心性，超越自身视角与情感的限制，从而提高智慧推理的水平(Grossmann et al., 2019)。加之 Levenson 等人(2005)建构的“智慧的自我超越理论”，自我超越与智慧的关系也是当前智慧心理学领域的热点话题之一(许文涛，汪凤炎，2022)。(4)智慧教育。当前世界暴力与冲突事件时有发生，不是因为人们不够聪明，而是缺少智慧，但现有的学校教育体系中却鲜有智慧教育(Sternberg & Hagen, 2019)。为改变这种现状，智慧教育逐渐受到关注。因智慧理论不同，智慧教育的主张也有较大差异。其中，Sternberg 依据智慧的平衡理论提出了其较系统的智慧教育的原则与手册(Sternberg, 2001a, 2001b, 2013, 2018; Sternberg & Hagen, 2019)；Ferrari 和 Potworowski (2008)合作编辑出版了《智慧教学：培育智慧的跨文化视角》论文集，Ferrari 和 Kim (2019)又进一步完善了他们的智慧教育主张；Grossman 等发现自我抽离自省日记法(the distanced-self-reflection diary method)可以促进智慧推理(Grossmann et al., 2021)；汪凤炎和郑红根据智慧的德才一体理论提出了“修德育才”的智慧教育主张(汪凤炎，2022；汪凤炎，郑红，2014)，等等。结果，智慧心理学的研究领域被大大拓宽(Sternberg & Glück, 2022)，呈现百花齐放的状态。

5 总结与展望

回顾智慧心理学近 50 年的研究历程，可以得到两个结论：

一是，近 50 年来，对智慧心理学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从分散到有组织、从零星探讨到系统研究的发展过程。作为现代科学智慧心理学研究的第一人，Clayton 的研究是自发的，且是一人在做，没有团队的协同合作。在智慧心理学研究史上，德国著名毕生发展心理学家 Baltes 在著名的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发展与教育研究所，首次领导一个顶尖科研团队有组织、有系统地专攻智慧心理学，最终诞生了著名的柏林智慧模式，推动了智慧心理学的发展。随着柏林智慧科研团队声名的升起以及著名心理学家斯腾伯格加入智慧心理学的研究，智慧心理学在美国心理学界的影响越来越大，吸引越来越多的欧美心理学家开始自觉地研究智慧。Baltes 于 2006 年去世后，原先聚集在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发展与教育研究所的智慧心理学家“开枝散叶”，分散到欧洲和北美的高校继续从事智慧心理学的研究。为了再次汇集科研力量开展团队攻关，2007 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成立“实践智慧研究中心” (Center for practical wisdom)，该中心在校内外拥有 11 个附属智慧实验室，Robert J. Sternberg、Ursula M.

Staudinger、Judith Glück、Monika Ardelt 与 Igor Groomsman 等智慧心理学领域的知名专家均是该中心的专家, 并于 2007 年 9 月宣布正式开展为期 3 年又 5 个月(2007.9~2011.1)的跨学科研究程序——阿瑞特倡议(interdisciplinary programs, Arete Initiative), 专门探讨"智慧"这一主题, 当年他们就投入 200 万美元的研究经费专攻"智慧的定义" ("Defining Wisdom"——a project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并向全世界招标关于"智慧"的研究课题, 内容涉及哲学、历史学、宗教学、伦理学、法学、教育学、心理学、生物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多个学科领域。最终从 600 多份申请中筛选出 23 名研究者进行资助, 阶段性研究成果于 2009 年 6 月和 2010 年 6 月通过举办两场智慧网络会议予以公布。自 2012 年至 2015 年, 又开始了第二轮的智慧研究, 由芝加哥大学教授领导的 6 个研究项目, 重点研究 3 个问题: 专业知识和智慧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经验如何增长智慧? 在智慧生成的过程中, 认知、社会和情感过程扮演什么角色? 阶段性研究成果于 2014 年和 2015 年通过举办两场智慧网络会议予以公布, 在智慧心理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是, 研究对象从智慧者的特征(人格特征)到智慧特征, 再到智慧者的特征, 再到结合智慧者的特征和智慧特征来研究智慧, 经历了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Clayton 认识到很难用实证法直接研究智慧, 开始是想从被提名智慧者的身上寻找智慧的特征, 以验证她早前通过分析智慧的文献后得到的智慧定义的恰当与否, 但研究结果不理想。于是, Clayton 改变研究思路, 让被试对这 33 个描述智慧的词汇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描述智慧者进行 7 点评分, 但结果仍不理想。最后, 改用多维标度法研究青年人、中年人和老人等 3 个群体的内隐智慧观, 最终取得成功, 完成了其博士论文, 并首次给智慧下了一个经验性定义。后继者 Baltes 与 Clayton 研究智慧的视角有差异: Baltes 及其团队从人工智能的专家系统中汲取灵感, 关注的是智慧本身的特征, Baltes 认为 Clayton 与后来的 Ardelt 一样, 关注的是智慧者的特征, 而不是智慧本身的特征; 智慧者的特征虽接近智慧, 却不能将智慧者的特征等同于智慧, 二者不是一回事(Baltes & Kunzmann, 2004)。这是 Clayton 在智慧心理学上的创见没有对 Baltes 及其团队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个根本原因。再往后, 新皮亚杰主义试图从思维方式上揭示智慧的本质, Sternberg 和 Ardelt 等人则回到智慧者的特征上研究智慧。当下, 研究者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智慧是一个多维结构的构念(Clayton, 1976), 主张从行为层面、心理素质层面以及个体或群体角度界定智慧(Zhang et al., 2022), 实际上是结合智慧者的特征和智慧特征来研究智慧, 以化解这一争论。

展望未来, 宜在两个方面推进智慧心理学的研究:

一是, 须尽快开发研究智慧的成熟实验范式, 并揭示智慧的脑机制。目前, 对智慧的研究主要采用理论分析法、语义分析法、质性研究方法、问卷法和测量法, 尤其在测量法上取得了重要突破, 开发出多种成熟的智慧量表, 但尚缺乏成熟的智慧实验范式, 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智慧的实验研究, 尤其是无法知晓智慧的脑机制。须尽快开发研究智慧的成熟实验范式, 以进一步提升智慧心理学研究的科学性, 并揭示智慧的脑机制, 为开展智慧教育提供更科学的依据。

二是, 须积极开展智慧的应用研究。任何一门学科包括智慧心理学在内, 都只有对社会生活有实际的作用, 才能更好地生存和发展。目前智慧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基础研究领域, 在应用领域, 除了智慧教育外, 鲜有涉猎。为了让智慧心理学更贴近百姓的日常生活, 未来宜深入研究智慧在不同领域中的应用(Sternberg & Karami, 2021; Zhang et al., 2022), 为个体或群体在日常生活中更好地掌握与运用智慧提供理论依据与技术支持。如, 结合决策领域的研究, 深入探讨智慧建言(Hu et al., 2019)、智慧纳建(Zhang et al., 2022)以及愚蠢与智慧(e.g., Sternberg, 2002; 汪凤炎, 郑红, 2018)等主题, 提升个体的智慧决策水平; 关注智慧在管理学领域中的应用, 进一步考察领导者的智慧(e.g., Karami et al., 2020; Yang, 2011)、智慧管理(e.g., Nonaka et al., 2014)以及群体智慧等, 促进良好的社会治理; 与强人工智能领域合作, 开展人工智慧的研究(e.g., Jeste et al., 2020; 汪凤炎, 魏新东, 2018), 助推新一代可信赖人工智能的发展, 等等。

致谢: 非常感谢外审专家所提宝贵意见, 在论文修改过程中采纳了这些宝贵意见! 非常感谢 Vivian Clayton 教授和 Monika Ardelt 教授提供的相关宝

贵信息!

参考文献

陈浩彬, 汪凤炎. (2013). 智慧：结构、类型、测量及与相关变量的关系. *心理科学进展*, *21*(1), 108–117.

陈浩彬, 汪凤炎. (2016). 人慧与物慧：基于智慧描述词与提名智慧者的分类. *心理学探新*, *36*(3), 203–210.

陈浩彬, 汪凤炎. (2020). 中国文化中的智慧结构探析. *心理学探新*, *40*(1), 42–49.

傅绪荣, 汪凤炎. (2020). 整合智慧量表的编制及信效度检验. *心理学探新*, *40*(1), 50–57.

汪凤炎. (2022). 关于智慧教育的三个基本问题. *阅江学刊*, (1), 85–97.

汪凤炎, 魏新东. (2018). 以人工智慧应对人工智能的威胁. *自然辩证法通讯*, *40*(4), 9–14.

汪凤炎, 郑红. (2009). "知而获智"观：一种经典的中式智慧观. *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4), 104–110.

汪凤炎, 郑红. (2010). 五种西式经典智慧观的内涵及得失. *自然辩证法通讯*, *32*(3), 93–97.

汪凤炎, 郑红. (2014). *智慧心理学的理论探索与应用研究*. 上海教育出版社.

汪凤炎, 郑红. (2015). 品德与才智一体：智慧的本质与范畴. *南京社会科学*, (3), 127–133.

汪凤炎, 郑红. (2018). 论愚蠢的德才欠缺理论. *心理学探新*, *38*(5), 387–392.

汪凤炎, 郑红. (编著). (2022). *智慧心理学*. 上海教育出版社.

许文涛, 汪凤炎. (2022). 智者一定自我超越吗?智慧与自我超越的关系. *心理科学*, *45*(4), 778–784.

Achenbaum, W. A. (2004). Wisdom's vision of relations. *Human Development*, *47*(5), 300–303.

Aldwin, C. M. (2009). Gender and wisdom: A brief overview. *Research in Human Development*, *6(1)*, 1–8.

Ardelt, M. (1994). *Wisdom in the later years: A life course approach to successful aging* (Unpublished doctorial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Ardelt, M. (1997). Wisdom and life satisfaction in old age. *Journal of Gerontology: Psychological Sciences*, *52*(1), 15–27.

Ardelt, M. (2000). Antecedents and effects of wisdom in old age: A longitudinal perspective on aging well. *Research on Aging*, *22*(4), 360–394.

Ardelt, M. (2003).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a three-dimensional wisdom scale. *Research on Aging*, *25*(3), 275–324.

Ardelt, M. (2004a). Wisdom as expert knowledge system: A critical review of a contemporary operationalization of an ancient concept. *Human Development*, *47*(5), 257–285.

Ardelt, M. (2004b). Where can wisdom be found? A reply to the commentaries by Baltes and Kunzmann, Sternberg, and Achenbaum. *Human Development*, *47*(5), 304–307.

Ardelt, M. (2010). Age, experience and the beginning of wisdom. In D. Dannefer & C. Phillipson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social gerontology* (pp.306–316), Newbury Park: SAGE Publications Ltd.

Ardelt, M. (2011). Wisdom, age, and well-being. In K. W. Schaie & S. L. Willis (Eds.), *Handbook of the psychology of aging* (7th ed., pp. 279–291). Elsevier.

Ardelt, M., & Bruya, B. (2021). Three-dimensional wisdom and perceived stres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Journal of Adult Development*, *28*, 93–105.

Baltes, P. B., & Kunzmann, U. (2004). The two faces of wisdom: Wisdom as a general theory of knowledge and judgment about excellence in mind and virtue vs. wisdom as everyday realization in people and products. *Human Development*, *47*(5), 290–299.

Baltes, P. B., & Smith, J. (1990). Toward a psychology of wisdom and its ontogenesis. In R. J. Sternberg (Ed.), *Wisdom: Its natur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pp. 87–12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altes, P. B., & Smith, J. (2008). The fascination of wisdom: Its nature, ontogeny, and function.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3*(1), 56–64.

Baltes, P. B., Smith, J., & Staudinger, U. M. (1992). Wisdom and successful aging. In Theo B. Sonderegger (Ed.), *Nebraska symposium on motivation* (Vol. 39, pp.123–167).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Baltes, P. B., & Staudinger, U. M. (1993). The search for a psychology of wisdom.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3), 75–80.

Baltes, P. B., & Staudinger, U. M. (2000). Wisdom: A metaheuristic (pragmatic) to orchestrate mind and virtue toward excellence. *American Psychologist*, *55*(1), 122–136.

Bang, H., & Montgomery, D. (2013). Wisdom and ego-identity for Korean and American late adolescent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44*(5), 807–831.

Bang, H., & Zhou, Y. (2014). The function of wisdom dimensions in ego-identity development among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49*(6), 434–445.

Brienza, J. P., Fung, K., Santos, H. C., Bobocel, D. R., & Grossmann, I. (2018). Wisdom, bias, and balance: Toward a process-sensitive measurement of wisdom-related cognition. *Journal of Person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115*(6), 1093–1126.

Brown, S. C., & Greene, J. A. (2006). The wisdom development scale: Translating the conceptual to the concrete. *Journal of College Student Development*, *47*(1), 1–19.

Clayton, V. (1975a). Erikson's theory of human development as it applies to the aged: Wisdom as contradictive cognition. *Human Development*, *18*(1-2), 119–128.

Clayton, V. (1975b). *An exploratory analysis of the concept of wisdom*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Los Angeles.

Clayton, V. (1975c, October). The meaning of wisdom to young and old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The Meeting of the Gerontological Society*, Louisville.

Clayton, V. (1976). *A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analysis of the concept of wisdom* (Unpublished doctori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Los Angeles.

Clayton, V. (1982). Wisdom and intelligence: 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knowledge in the later yea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ing and Human Development*, *15*(4), 315–321.

Clayton, V., & Birren, J. E. (1980). The development of wisdom across the life span: A reexamination of an ancient topic. In P. B. Baltes and O. R. Brim (Eds.), *Life span development and behavior* (vol. 3, pp. 103–135). Cambridge, MA: Academic Press.

Druckerman, P. (2018). *There are no grown-ups: A midlife coming-of-age story*. London: Penguin Press.

Erikson, E. H. (1950). *Childhood and societ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Erikson, E. H. (1959). *Identity and the life cycl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Erikson, E. H. (1964). *Insight and responsibility. Lectures on the ethical implications of psychoanalytic insight*.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Ferrari, M., & Kim, J. (2019). Educating for wisdom. In R. J. Sternberg, & J. Glück (Eds.),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wisdom* (pp. 347–37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errari, M., & Potworowski, G. (2008). *Teaching for wisdom: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fostering wisdom*. Berlin: Springer Dordrecht.

Glück, J., König, S., Naschenweng, K., Redzanowski, U., Dorner, L., Straßer, I., & Wiedermann, W. (2013). How to measure wisdom: Content,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five measure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4*, 405.

Glück, J., & Weststrate, N. M. (2022). The wisdom researchers and the elephant: An integrative model of wise behavior.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26(4)*, 342–374.

Grossmann, I. (2017). Wisdom in context.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2*(2), 233–257.

Grossmann, I., Dorfman, A., Oakes, H., Santos, H. C., Vohs, K. D., & Scholer, A. A. (2021). Training for wisdom: The distanced-self-reflection diary method. *Psychological Science*, *32*(3), 381–394.

Grossmann, I., & Kross, E. (2014). Exploring Solomon's paradox: Self-distancing eliminates the self-other asymmetry in wise reasoning about close relationships in younger and older adults. *Psychological Science*, *25*(8), 1571–1580.

Grossmann, I., Na, J. K., Varnum, M. E. W., Kitayama, S., & Nisbett, R. E. (2013). A route to well-being: Intelligence versus wise reasoning.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42*(3), 944–953.

Grossmann, I., Na, J. K., Varnum, M. E. W., Park, D. C., Kitayama, S., & Nisbett, R. E. (2010). Reasoning about social conflicts improves into old ag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7*(16), 7246–7250.

Grossmann, I., Oakes, H., & Santos, H. C. (2019). Wise reasoning benefits from emodiversity, irrespective of emotional intensit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48*(5), 805–823.

Grossmann, I., Weststrate, N. M., Ardelt, M., Brienza, J. P., Dong, M., Ferrari, M., … Vervaeke, J. (2020). The science of wisdom in a polarized world: Knowns and unknowns. *Psychological Inquiry*, *31*(2), 103–133.

Guilford, J. (1954). *Psychometric methods*. New York: McGraw-Hill.

Hall, S. G. (1922). *Senescence, the last half of life*. New York: D. Appleton and Company.

Hall, S. S. (2010). *Wisdom: From philosophy to neuroscience*. New York: Knopf Press.

Hu, C. S., Huang, J. H., Ferrari, M., Wang, Q. D., Xie, D., & Zhang, H. T. (2019). Sadder but wiser: Emotional reactions and wisdom in a simulated suicide interven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54*(6), 791–799.

Jason, L. A., Reichler, A., King, C., Madsen, D., Camacho, J., & Marchese, W. (2001). The measurement of wisdom: A preliminary effort.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29*(5), 585–598.

Jeste, D. V., Graham, S. A., Nguyen, T. T., Depp, C. A., Lee, E. E., & Kim, H. C. (2020). Beyo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xploring artificial wisdom. *International Psychogeriatrics*, *32*(8), 993–1001.

Karami, S., Ghahremani, M., Parra-Martinez, F. A., & Gentry, M. (2020). A polyhedron model of wisdom: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wisdom studies in psychology, management and leadership, and education. *Roeper Review*, *42*(4), 241–257.

Kim, S., & Knight, B. G. (2015). Adaptation of the three-dimensional wisdom scale (3D-WS) for the Korean cultural context. *International Psychogeriatrics*, *27*(2), 267–278.

Kitchener, K. S., & Brenner, H. G. (1990). Wisdom and reflective judgment: Knowing in the face of uncertainty. In R. J. Sternberg (Ed.), *Wisdom: Its natur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pp. 212–22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ross, E., & Grossmann, I. (2012). Boosting wisdom: Distance from the self-enhances wise reasoning, attitudes, and behavior.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41*(1), 43–48.

Labouvie-Vief, G. (1980). Beyond formal operations: Uses and limits of pure logic in life-span development. *Human Development*, *23*(3), 141–161.

Labouvie-Vief, G. (1990). Wisdom as integrated thought: Historical and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s. In R. J. Sternberg (Ed.), *Wisdom: Its natur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pp. 52–8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evenson, M. R., Jennings, P. A., Aldwin, C. M., & Shiraishi, R. W. (2005). Self-transcendence: Conceptualization and measure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ing and Human Development*, *60*(2), 127–143.

Mickler, C., & Staudinger, U. M. (2008). Personal wisdom: Validation and age-related differences of a performance measure. *Psychology and Aging*, *23*(4), 787–799.

Naranjo, C. (1972). *The one quest*.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Nonaka, I., Chia, R., Holt, R., & Peltokorpi, V. (2014). Wisdom,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Learning*, *45*(4), 365–376.

Pasupathi, M., Staudinger, U. M., & Baltes., P. B. (2001). Seeds of wisdom: Adolescents' knowledge and judgment about difficult life problem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7*(3), 351–361.

Piaget, J. (2001). *The psychology of intelligence*. London: Routledge.

Riegel, K. F. (1973). Dialectical operations: The final period of cognitive development. *Human Development*, *16*(5), 346–370.

Smith, J., & Baltes, P. B. (1990). Wisdom-related knowledge: Age/Cohort differences in response to life-planning problem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6*(3), 494–505.

Staudinger, U. M., Smith, J., & Baltes, P. B. (1994). *Manual for the assessment of wisdom-related knowledge* (Technical Report No. 46). Berlin: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Human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Sternberg, R. J. (1985). Implicit theories of intelligence, creativity, and wisdo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9*(3), 607–627.

Sternberg, R. J. (1986). Intelligence, wisdom, and creativity: Three is better than one. *Educational Psychologist*, *21*(3), 175–190.

Sternberg, R. J. (Ed.). (1990a). *Wisdom: Its natur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ternberg, R. J. (1990b). Wisdom and its relations to intelligence and creativity. In R. J. Sternberg (Ed.), *Wisdom: Its natur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pp. 142–15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ternberg, R. J. (1998). A balance theory of wisdom.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2*(4), 347–365.

Sternberg, R. J. (2001a). Why schools should teach for wisdom: The balance theory of wisdom in educational settings. *Educational Psychologist*, *36*(4), 227–245.

Sternberg, R. J. (2001b). How wise is it to teach for wisdom? A reply to five critiques. *Educational Psychologist*, *36*(4), 269–272.

Sternberg, R. J. (Ed.). (2002). *Why smart people can be so stupi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Sternberg, R. J. (2004). Words to the wise about wisdom? A commentary on Ardelt's critique of Baltes. *Human Development*, *47*(5), 286–289.

Sternberg, R. J. (2013). Reform education: Teach wisdom and ethics. *Phi Delta Kappan*, *94*(7), 45–47.

Sternberg, R. J. (2018). Wisdom, foolishness, and toxicity in human development. *Research in Human Development*, *15*(3–4), 200–210.

Sternberg, R. J. (2019). Four ways to conceive of wisdom: Wisdom as a function of person, situation, person/situation interaction, or action. *The Journal of Value Inquiry*, *53*, 479–485.

Sternberg, R. J., & Glück, J. (Eds.). (2019).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wisdo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ternberg, R. J., & Glück, J. (2022). *Wisdom: The psychology of wise thoughts, words, and deed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ternberg, R. J., & Hagen, E. S. (2019). Teaching for wisdom. In R. J. Sternberg, & J. Glück (Eds.),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wisdom* (pp. 372–406).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ternberg, R. J., & Jordan, J. (Eds.). (2005). *A handbook of wisdom: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ternberg, R. J., & Karami, S. (2021). What is wisdom? A unified 6P framework.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25*(2), 134–151.

Sternberg, R. J., Nusbaum, H. C., & Glück, J. (Eds.). (2019). *Applying wisdom to contemporary world problems*. Cham, Switzerland: Palgrave Macmillan.

Thomas, M. L., Bangen, K. J., Ardelt, M., & Jeste, D. V. (2017). Development of a 12-item abbreviated three-dimensional wisdom scale (3D-WS-12): Item selection and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Assessment*, *24*(1), 1–12.

Thomas, M. L., Bangen, K. J., Palmer, B. W., Martin, A. S., Avanzino, J. A., Depp, C. A., … Jeste, D. V. (2019). A new scale for assessing wisdom based on common domains and a neurobiological model: The San Diego Wisdom Scale (SD-WISE). *Journal of Psychiatric Research*, *108*(40), 40–47.

Wang, F. Y., & Zheng, H. (2012). A new theory of wisdom: Integrating intelligence and morality. *Psychology Research*, *2*(1), 64–75.

Wang, Z. D., Wang, Y. M., Li, K., Shi, J., & Wang, F. Y. (2022). The comparison of the wisdom view i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Current Psychology*, *41*(11), 8032–8043.

Webster, J. D. (2003). An exploratory analysis of a self–assessed wisdom scale. *Journal of Adult Development*, *10*(1), 13–22.

Webster, J. D. (2007). Measuring the character strength of wisdo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ing and Human Development*, *65*(2), 163–183.

Webster, J. D. (2010). Wisdom and positive psychosocial values in young adulthood. *Journal of Adult Development*, *17*(2), 70–80.

Webster, J. D., Weststrate, N. M., Ferrari, M., Munroe, M., & Pierce, T. W. (2018). Wisdom and meaning in emerging adulthood. *Emerging Adulthood*, *6*(2), 118–136.

Xiong, M. M., & Wang, F. Y. (2022). Manifestations of wisdom in ancient China: An analysis of the Zhinang Quanji. *Culture & Psychology*, *28*(4), 506–526.

Yang, S. Y. (2011). Wisdom displayed through leadership: Exploring leadership-related wisdom.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22*(4), 616–632.

Zhang, K. L., Shi, J., Wang, F. Y., & Ferrari, M. (2022). Wisdom: Meaning, structure, types, arguments, and future concerns. *Current Psychology*. https://doi.org/10.1007/s12144-022-02816-6

"One prelude" and "two movements": A portrayal of the research process of wisdom psychology in the past 50 years

ZHANG Kaili, ZHENG Hong, WANG Fengyan

(*Institute of Moral Educatio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School of Psycholog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Abstract: The research history of wisdom psychology in the past 50 years is comprehensively reviewed, critically drawing on the work of Sternberg and Glück. The symphony of the development of wisdom psychology consists of "one prelude" and "two movements". Specifically, "one prelude" refers to Vivian Clayton's wisdom research, which started no later than 1976 and ended abruptly in 1982, when Clayton left academia. Clayton elevated the concept of wisdom to scientific status for the first time, paving the way for empirical research on wisdom psychology. The "two movements" are "one flower blooming with two buds" and "all flowers bloom together". The first stage of wisdom psychology, begun in the early 1980s, was characterized by the leading position of the Berlin wisdom model, which shed light on an expert knowledge system dealing with the fundamental pragmatics of life, as well as neo-Piagetian theory and the balance theory of wisdom by Robert J. Sternberg. The second stage of wisdom psychology began with Monika Ardelt's critical review of the Berlin group's definition, operationalization, and particular measurement of wisdom in 2004 and has continued to this day. In reviewing the research history of wisdom psychology over the past half-century, two conclusions can be drawn. First, the study of wisdom psychology has evolved from spontaneity to consciousness, from dispersion to organization, and from sporadic discussion to systematic research. Second, the research object of wisdom has gone through an alternate spiral change process that from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ise person to characteristics of wisdom per se, and back to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ise person, until finally, integration of the two. Furthermore, future research on wisdom psychology should be promoted in two areas. One aspect is to develop a maturely experimental paradigm for studying wisdom directly and revealing its brain mechanism. The other is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study of applying wisdom to real-life situations.

Keywords: implicit three-dimensional wisdom view, Berlin wisdom model, neo-Piagetian theory, the balance theory of wisdom, explicit three-dimensional wisdom model